

民初清学史书写中的身份认同与叙述政治

——以李慈铭传为中心

王思雨

摘要 后人在回顾、总结有清一代学术时，往往绕不开李慈铭（越缦）其人。20世纪30年代出自王式通之手的《清儒学案·越缦学案》小传，实际由平步青撰传、《清史稿·李慈铭传》以及王式通为王重民辑《越缦堂文集》所作跋文内容结合而成。因生前未有经史专著，对李慈铭应列入儒林还是文苑，归入正案还是诸儒一事，缪荃孙、吴士鉴、徐世昌、夏孙桐等人进行了深入讨论。最终，这些书写构成了后世认知李慈铭学术形象的基础性文本，而其背后的文本生成机制，不但折射出编纂者的身份认同情况，也显示了民初清学史书写中的叙述政治特质。

关键词 李慈铭 清学史 身份认同 叙述政治

作者王思雨，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5)04-0206-11

作为晚清著名学者，李慈铭早年以工韵语、擅词章闻名乡里，后经学政吴钟骏引领，步入经史正轨。捐官入京后，他的见闻和学养日增，逐渐走上独尊乾嘉汉儒的治学路径。所著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越缦堂日记》更让他声名显赫，引人瞩目。然而，因学术成果多散见于日记中，日记刊印一事又延宕无期，其余经史著作或皆未刊，或又不见流传^①，各界对他在清学史上地位和成就的评价层出不穷，且时常两极分化。^②

实际上，“狂生”而外^③，李慈铭的历史形象认知当置于三份传记文本的互文性网络中考察：平步青《掌山西道监察御史督理街道李君菴客传》《清史稿·李慈铭传》《清儒学案·越缦学案》小传。三者分别对应私人著述、民初官方史著与半官方学术工程。其性质从“私人悼亡”到“故国叙事”的嬗变，构成观察清末民初政权鼎革和知识话语转型的棱镜。现有研究多着力于李慈铭生平、思想、日记、书札、未刊

① 张桂丽：《李慈铭的清学史观——以〈国朝儒林经籍小志〉为中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第2期。

② 蔡长林：《长日将尽，典型夙昔——李慈铭学术批评中所见的乾嘉情怀及其意义》，《人文中国学报》第20期（2014年9月），第114—116页。早期关于李慈铭的资料汇总与研究成果，可参见朱传誉主编：《李慈铭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81年。

③ 这涉及一则公案，即翁同龢曾将日记中“康有为”或“康祖诒”三字删改为“李菴客”。详情可参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翁文恭公日记〉稿本与刊本之比较——兼论翁同龢对日记的删改》，《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稿等^①，较少关注上述传记文本，从而未能深度解析李慈铭形象流变过程以及文本生成背后折射出的身份认同和叙述政治特质。

因此，本文拟借助《樵隐昔癯》《清儒学案》、上海图书馆藏《儒学传不分卷文学传不分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稿·文苑传》稿本等关键材料，辅以《艺风堂友朋书札》《清儒学案书札》等书札文献，通过比对不同阶段的文本，分析书札中提及的传目、学派归属争议，结合撰人的身份背景和政治取向，回答三个层面的问题：（1）《越缦学案》小传的史源；（2）李慈铭从“诗史兼长”到“同光后劲”再到“学案大家”的形象演变；（3）民初清学史书写中的身份认同和叙述政治。

一、史源发覆：从家传、史稿到学案

尽管徐世章极力认为“编学案不易蒞事，且稍有疵累，易致人指摘”^②，徐世昌依旧召集章华、金兆蕃、曹秉章、夏孙桐、王式通等学人在1928年末定议开纂《清儒学案》，并通过十年编纂完成这部巨型学术工程。过溪在回忆《清儒学案》的编纂过程时说道：“开始拟具编纂方案，商榷体例案名，然后个人分担功课，由夏氏持其总”^③，对后来研究者颇有提示意义。今《清儒学案书札》和《清儒学案存稿》中留下的诸多细节，使进一步讨论各案的编纂成为可能。本节即对《越缦学案》小传的史源进行梳理，以展现三种传记间的互文关系。

在1929年初写成的《学案编辑概略》中，小传一列的要求为“根据前人旧文增删，不载细事。旧文有显误者，宜加改正，文字亦宜剪裁。传末注参某某书”。^④核之《越缦学案》小传，显然遵循了此格式：

李慈铭初名模，字式侯，后更名慈铭，字烝伯，号莼客，会稽人。生有异才，长益覃思劬学，于书无所不窥。时越高高才生，咸推为职志。初官户部郎中，光绪庚辰成进士，归本班补官。后迁御史，巡视北城，督理街道，皆举其职。数上封事，洞中利弊，不避权要。甲午夏，中日启衅，败闻日至，感愤咯血而卒，年六十有六。少时曾从宗先生稷辰游，入四贤讲堂，后专治汉学，仍服膺宋儒。平生矜尚名节，务矫俗流，有裁制人伦、整齐物类之心，而道孤命蹇，志未少伸。其《复陈画卿书》云有《正名》二十篇，颇自负为内圣外王之学，足以继《明夷待访录》《日知录》而起，须俟身后始出。说经确守乾嘉诸老家法，于史学致力最深，日有课记，每读一书，必求其所蓄之深浅、致力之先后评鹭之，务得其当……其著作，于经有……于史有……又有……凡百数十卷。参史传、平步青撰《传》^⑤

具体说来，小传所采的前人旧文为“史传”和“平步青撰《传》”，后者稍好理解，指向由平步青所撰的《掌山西道监察御史督理街道李君莼客传》一文。

（一）史源之一：平步青撰传

平步青，字景荪，号栋山樵、霞外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同治元年（1862）进士。“平步青与李慈铭既为同乡，又志趣相投，二人都喜欢笔记小说，重视整理乡邦文献。虽然因李慈铭个性狷介，两人曾有不合，但因平步青温厚宽容，二人终成终生挚友”。^⑥基于此种关系，平氏承担起了为好友撰传的工作。在蔡元培1896年二月的日记中，已有“止轩先生示以平景荪前辈所作《李越缦先生传》，拟录一

① 代表研究如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董丛林《论晚清名士李慈铭》（《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5期）、卢敦基《彷徨歧路：晚清名士李慈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张桂丽《李慈铭的清学史观——以〈国朝儒林经籍小志〉为中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第2期）、张桂丽《李慈铭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谢冬荣《李慈铭研究》（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刘晓丽《李慈铭稿本〈越缦堂杂著〉十五种述论》（《历史文献研究》2021年第1期），余不赘述。

② 贺葆真日记1930年11月5日，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562页。

③ 过溪：《清儒学案纂辑记略》，《艺林丛录》第7编，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61年，第116页。夏氏指夏孙桐。

④ 《清儒学案存稿》稿本第1册，上海图书馆藏，无页码。

⑤ 徐世昌著，沈芝盈、梁运华点校：《清儒学案》第185卷，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845—4846页。

⑥ 付凤娟：《浙人平步青及其文献学成就初探》，《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通”^①的记载。该传大要如下：

君姓李氏，初名模，字式甫，后更名慈铭，字烝伯，号蕤客，浙江会稽人。生有异才，年十二三即工韵语，集中所存游兰亭诸诗是也。长益覃思劬学，于书无所不窥。时越多高才生，咸推君为职志……己丑试御史，庚寅补山西道监察御史，转掌山西道，巡视北城，督理街道，皆举其职。数上封事，洞中利弊，不避权要。被旨允行或报闻，君项项不自得。今年夏，倭夷犯边，败问日至。知君者颇讶，何以无所论劾。盖君戾削善病，至是独居，深念感愤，扼腕咯血益剧，遂以十一月二十四日竟卒，年六十有六。

君自谓于经史子集及稗官、梵夹、诗余、传奇无不涉猎而樵放之，而所致力者莫如史；所为散文、骈体、考据、笔记、诗歌、词曲积稿数尺，而所得意者莫如诗，读者以为定论……君子于经学有……于史有……又有……凡百数十卷。可谓硕学鸿文，蔚为著述者也。友人仅刻其骈体文钞二卷，诗初集十卷，余未礼堂写定，传之其人……^②

大致围绕李慈铭的生平和学行展开。其中的“君自谓”至“莫如诗”诸句，取自李慈铭《白华绛跗阁诗初集自序》^③或是出于对仗起见，传文将原文“所学于史为稍通”一句改成了“所致力者莫如史”，并将“而所致力莫如杜”一句删去。

（二）史源之二：《清史稿·李慈铭传》

回到学案小传的另一史源——“史传”，其名称由来可溯源至夏孙桐和曹秉章的“观念之争”。因纂修学案时参考书目“所得见者从前坊刻之《儒林》《文苑》两传^④，及中华书局印行之《清史列传》”^⑤，同人此前在引用坊刻旧本时书“国史”，引用书局印本时书“清史”。^⑥在曹秉章提出统一书为“史传”的意见后，夏孙桐仍执意“道光以前书‘国史某传’，道光以后书‘清史某传稿’”，并谓“《国史》是一书，《清史》是一书，非分别写明不可”^⑦，故曹氏不得不致函徐世昌斟酌。最终，徐氏赞同“史传”的写法。这也导致研究者认为，“今天我们见到的《清儒学案》标注‘史传’，实非同一版本，因徐世昌没能采纳夏孙桐意见，故现在所用何书已不可考”。^⑧不过，针对李慈铭小传，“所用何书已不可考”一句有待商榷。

1934年，曹秉章回忆道：“初开办时所拟《草目》，本系闰枝与同人分据坊刻之《儒林》《文苑》两传及《先正事略》《国朝学案小识》之书，参酌为之”。^⑨此处的《草目》指拟编学案人物名单。结合他此前的说法：“当开办之初，同人各据所知，与旧有书传中所列者，略具诸儒姓氏，编为《草目》：闰枝、书衡所据者，为缪筱珊所撰之《清史·儒林》《文苑》两传稿，与坊间印行之《清史列传》稿；葆之则据《畿辅先哲传》与《中州征献录》分摘直隶、河南两省之人，汇叙成目”^⑩，可知同人在撰写《草目》时利用的大致文献。

李慈铭最初即列于《草目》名单中，而其名又仅见于《清史稿·文苑传》，那么可推测的是，同人为

① 蔡元培日记 1896年二月三日（3月16日），蔡元培著，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5卷（日记1894—1911），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998年，第67页。芷轩先生指王继香，李慈铭弟子。

② 平步青：《樵隐昔癡》卷18《掌山西道监察御史督理街道李君蕤客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49页。《越缙堂日记》影印出版时曾附上平氏此文，其中“倭夷犯边”四字改成了“中日启衅”，见《越缙堂日记》，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2页。

③ 李慈铭：《白华绛跗阁诗初集自序》，李慈铭撰，王重民辑：《越缙堂文集》第2卷，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1930年，第6页a。

④ 当指同治年间坊间出现的《国史儒林传》二卷、《文苑传》二卷、《循吏传》一卷、《贤良传》二卷合刻本。关于此书的研究可参见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9本第1分（2008年3月），第63—93页；赵永磊：《〈国史儒林传〉与阮元〈儒林传稿〉关系辨误》，《文献》2019年第2期。

⑤ 关于此书，可参见王鍾翰：《清国史馆与〈清史列传〉》，《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3期。

⑥ 《曹秉章来函》，1934年六月廿八日（8月8日），李立民：《〈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34—235页。

⑦ 《曹秉章来函》，1934年七月初八日（8月17日），李立民：《〈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第239页。

⑧ 刘凤强：《〈清儒学案〉编纂考》，《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

⑨ 《曹秉章来函》，1934年七月十四日（8月23日），李立民：《〈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第241页。

⑩ 《曹秉章来函》，1930年九月廿五日（11月15日），李立民：《〈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第29页。

其提名时所据的资料当为后者。由此，负责撰写清史《文苑（学）传》的缪荃孙、修订者金梁及最终的《清史稿·李慈铭传》便进入了我们的考察视野。

缪荃孙曾担任国史馆修纂、总纂，负责《儒林传》《文苑传》《循吏传》《孝友传》《隐逸传》的纂修。^① 受聘于清史馆后，五传仍由其认领。^② 今上海图书馆藏有缪荃孙著《儒学传不分卷文学传不分卷》一书，周庆许认为此为缪氏清史馆初纂稿的底稿，阎昱昊近来的研究亦证实了此看法。^③ 其中的《文学传·李慈铭传》，为我们了解缪荃孙版李氏传提供了方便。具体内容如下：

李慈铭，字爱伯，会稽人。诸生，入赘为户部郎中。至都，即以诗词俚体名于时。每读一书，必求其所蓄之深浅，致力之先后，而评鹭之，各得其当，后进翕然大服，大学士周祖培、尚书潘祖荫引为上客。光绪六年进士，归本班，年五十二矣。擢山西道御史，时佞人当国，朝政日非，慈铭请临雍，请整顿台纲。大臣则纠孙毓汶、孙楫，疆臣则纠德馨、沈秉成、裕宽，数上疏，均不报。慈铭内颇郁郁，遂卒，年六十六。

慈铭性狷介，不求人，又口多雌黄。服其学者好之，憎其口者恶之。俚体文气，盛言宜戛戛独造无一语落小家。数诗则选声鍊色，融洽古今，自成为一家之诗，当时罕有俦偶。惜所著撰不传，止存越缙堂文十卷、白华绛趺阁诗十卷、词二卷。弟子著录数百人，而同邑陶方琦为最。^④

值得注意的是，在缪荃孙将《文学传》上交史馆后，馆内同人曾恢复《文苑》原名，并由马其昶、柯劭忞、金梁等人多次更改。^⑤ 据金梁回忆，他入馆重新参订《文苑传》时，“复为补辑三魏（禧等）、钱（谦益）、戴（名世）及文（昭）、李（锴）以至周（寿昌）、冯（桂芬）、李（慈铭）、张（裕钊）、吴（汝纶）、林（纾）、严（复）等正附各传，弥缝补缀”。^⑥ 幸而出于对缪稿的推崇，其所撰《李慈铭传》基本延续了缪氏《文学传》原稿（见着重号部分）。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史稿·李慈铭传》稿本，仅可见金梁对底稿中李氏传的少量修改痕迹。稿本版《李慈铭传》也成为最终的刊本《清史稿·李慈铭传》（附传内容亦相同），全文为：

李慈铭，字爱伯，会稽人。诸生，入赘为户部郎中。至都，即以诗文名于时。大学士周祖培、尚书潘祖荫引为上客。光绪六年，成进士，归本班，改御史。时朝政日非，慈铭遇事建言，请临雍，请整顿台纲。大臣则纠孙毓汶、孙楫，疆臣则纠德馨、沈秉成、裕宽，数上疏，均不报。慈铭郁郁而卒，年六十六。

慈铭为文沉博绝丽，诗尤工，自成一家。性狷介，又口多雌黄。服其学者好之，憎其口者恶之。日有课记，每读一书，必求其所蓄之深浅，致力之先后，而评鹭之，务得其当，后进翕然大服。著有越缙堂文十卷，白华绛趺阁诗十卷、词二卷，又日记数十册。弟子著录数百人，同邑陶方琦为最。^⑦

至此可确定，“史传”一词是《清史稿·李慈铭传》的缩称。

（三）史源之三：王式通《越缙堂文集跋》

在厘清小传所参书目后，我们还需将视线转向《越缙学案》的具体负责人。曹秉章在1930年六月写给徐世昌的信札中提到，“书衡所编陈奂《南园学案》、李慈铭《越缙学案》各一册，均经闰枝覆阅交来，兹特寄呈钧鉴”^⑧，为我们指出了线索。

书衡即前述王式通，又名仪通，字叔衡，号志龛，山西汾阳人，光绪戊戌年（1898）进士，民国期间一度任全国水利局副局长。在《学案》纂修初期，王式通和夏孙桐除分别认领各案外，还共同负责稿件的

① 杨洪升：《缪荃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14页。

② 夏孙桐入馆后，《循吏传》交其办理，缪荃孙则以“明遗臣”传补为新五传，见《缪荃孙函五》（1915年9月1日），上海博物馆图书馆编：《冒广生友朋书札》，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第230页。按，括号内时间为笔者所考，下同。

③ 周庆许：《〈清史稿·儒林传〉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84页；阎昱昊：《晚清民国清史〈儒林传〉研究》，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174—175页。

④ 《儒学传不分卷文学传不分卷》稿本，上海图书馆藏，第490—491页。按，本书无页码。为复核方便，此处以电子全文页数为页码。

⑤ 参见苏晓芳：《〈清史稿·文苑传〉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9—15页。

⑥ 金梁：《道咸同光四朝佚闻》卷下《重印文苑传叙》，《史料七编》，台北：广文书局，1978年，第94—95页。

⑦ 《文苑传·李慈铭》，《文苑3》传稿（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86《李慈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440—13441页。

⑧ 《曹秉章来函》，1930年六月廿七日（7月22日），李立民：《〈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第26页。

审阅工作。遗憾的是，王氏在 1931 年 10 月因病逝世，名下遗留张之洞、俞樾两大学案未编。^① 在其歿后，夏孙桐对其编辑的旧稿“屡腾口说”并欲修改^②，徐世昌则认为：“书衡已作古人，尚欲存故人之手稿也”。^③ 该意见也由曹秉章录送至夏氏处。^④

在徐世昌的强调下，编纂同人此后对王式通负责的各学案并未有过多改动，因此我们可将最终刊出的《清儒学案·越缦学案》视为王氏一手成之。同时，学案小传中有不少句子不见于平步青撰传和“史传”，当为王式通的“原创”成果。更有意思的是，“原创”中亦有“旧文”痕迹。

1930 年 1 月，王重民完成了《越缦堂文集》的辑录工作。在《书〈越缦堂文集〉目录后》中，除交代文集的基本参考书外，他还点出了王式通及其《越缦丛稿》^⑤ 的作用。^⑥ 或因此，王重民顺势邀请了王式通为《文集》作跋，后者在作于 1929 年十二月的《越缦堂文集跋》中写道：

右越缦堂文集十二卷，高阳王有三重民校定……有三在馆，先辑诸史札记次第成书，兹复搜集散文，得百三十四篇，与虚霏居曾氏所刻骈体文，合若析圭曾氏附录，暨余氏手写之文，俱并入汇刊。惟先生《复陈画卿书》有散文分内外篇，约二百首之语；又云《正名》二十篇，颇自负为内圣外王之学，足以继《明夷待访录》《日知录》而起，须俟身后始出，此已阙如……先生说经确守乾嘉诸老家法，于史学致力最深。平生矜尚名节，务矫流俗，有裁制人伦、整齐物类之心，而道孤命蹇，志未稍伸，形诸简觚，可知梗臬。^⑦

“复陈画卿书”一句，实摘自《越缦堂骈体文》卷 2《复陈画卿观察书》。^⑧ 不久后，王式通将画线诸句悉数移至正在编写的《越缦学案》小传中。在撰成《越缦学案》后，“裁制人伦、整齐物类”八字又被他继续用于次年四月所写的《越缦堂读史札记序》，可谓一举多得。

(四) 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越缦学案》小传中除若干句子为王式通撰传时的原创，其余内容均可找到“旧文”痕迹（见画线部分）。史源总结如表 1。

表 1

《清儒学案·越缦学案》	出处
李慈铭初名模，字式侯，后更名慈铭，字孟伯，号莼客，会稽人。生有异才，长益覃思幼学，于书无所不窥。时越多高才生，咸推为职志……巡视北城，督理街道，皆举其职。数上封事，洞中利弊，不避权要。甲午夏，中日启衅，败闻日至，感愤咯血而卒，年六十有六……于经有……于史有……又有……凡百数十卷。	平步青：《掌山西道监察御史督理街道李君莼客传》
平生矜尚名节，务矫俗流，有裁制人伦、整齐物类之心，而道孤命蹇，志未少伸。其《复陈画卿书》云有《正名》二十篇，颇自负为内圣外王之学，足以继《明夷待访录》《日知录》而起，须俟身后始出。说经确守乾嘉诸老家法，于史学致力最深。	王式通：《越缦堂文集跋》
日有课记，每读一书，必求其所蓄之深浅、致力之先后评鹭之，务得其当。	缪荃孙：《文学传·李慈铭传》、金梁：《清史稿·李慈铭传》

二、叙述转变：重文还是宗经？

平步青在李慈铭人物品格的塑造上，可谓通过策略性剪裁实现了好友形象的提纯。一方面，他通过隐去攻讦他人的争议性举动，淡化了传主在时人心中的“狂士”印象。另一方面，他借助对李氏御史任内谏诤事迹的勾勒，对其在甲午年不置一词的辩护，刻画出了一位典型的“清流御史”。在学术定位层面，传

① 《曹秉章来函》，1931 年八月廿七日（10 月 8 日），李立民：《〈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第 53 页。

② 《曹秉章来函》，1934 年六月十七日（7 月 28 日），李立民：《〈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第 232 页。

③ 《徐世昌批语》，李立民：《〈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第 232 页。

④ 《曹秉章来函》，1934 年七月初八日（8 月 17 日）、1934 年七月十四日（8 月 23 日），李立民：《〈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第 238、241 页。

⑤ 李慈铭当下可见著述中并未有此书，应为各种零星书目之总称。李氏著述目录参见张桂丽：《李慈铭年谱》附录二《著述目录》，第 440—457 页；刘晓丽：《李慈铭稿本〈越缦堂杂著〉十五种述论》，《历史文献研究》2021 年第 1 期。

⑥ 王重民：《书〈越缦堂文集〉目录后》，李慈铭撰，王重民辑：《越缦堂文集》，第 6 页 b。

⑦ 王式通：《越缦堂文集跋》，李慈铭撰，王重民辑：《越缦堂文集》，第 1 页。

⑧ 李慈铭著，刘再华校点：《越缦堂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1149 页。

文通过对自序的改动，构建出传主的双重身份——既以“所致力者莫如史”身份纳入经世致用的学术谱系，又以“所得意者莫如诗”定位贴近传统文人的审美取向。这种书写策略不仅暗合晚清“学人”与“文人”身份分野的时代语境，亦透露出为传主弥合不同评价体系的内在意图，最终完成了一个兼具政治气节、学术地位与文学成就的多维身份建构。

那么，在清廷覆灭，总结前朝学术史的背景下，《清史稿》《清儒学案》又是如何塑造李慈铭？叙述转变背后反映了哪些意图？为回答这些问题，本节转向对《清史稿·李慈铭传》《清儒学案·越缙学案》小传生成语境或者说叙述转变原因的考察。

（一）“列入文苑，尚可为同光后劲”

听闻李慈铭去世的消息后，缪荃孙颇有感叹：“今年封疆大吏如刘中丞锦棠、谭中丞钧培、周提督达武、黄提督翼升，吾辈如朱鼎甫同年一新、蔡松生同年右年、许鹤巢先生玉琢、陆存斋观察心源均谢世，今越缙又继之，大有老成凋谢之感。”^①深知“今所传仅诗十卷，骈文数十篇，实不足尽莼客也”^②的他，除热心于校订、刊布《越缙堂日记钞》外^③，也积极关注李氏日记的出版情况^④，并在日记影印时列名赞同。^⑤在为好友寻找身后位置时，他亦十分看重和谨慎。

在正式开撰《文学传》前，缪荃孙曾询问史馆同人吴士鉴：“李越缙列之《文苑》，而陶仲彝力争《儒林》，不知两传有何轩轻？越缙经学过于湘绮，而只有《经说》数篇，殊不相合。从前谈过，条理通贯，别无专书，放下再说。”^⑥这里的“别无专书”指向《儒林传》的收录原则，即光绪年间与缪荃孙共事修史的谭宗浚所言：“儒林须著作有关于经学，或述程朱奥义，或阐郑孔传笺者，方行采录。至文苑传，则博洽多闻，淹通史学者为上，而工诗古文词者次之，亦史例也。”^⑦因了解李慈铭并无经史专著，吴士鉴回复道：

越缙于经、小学未有著述，似难列于儒林。曾忆癸巳秋闱，此老监试，侄与闲谈，叩以生平著作，自言于经、小学毫无心得，即有一二说经之文，亦蹈袭前人，不足自立。故葵园刻《续经解》时来征所著，婉言谢之。此老自言如是，可见得失甘苦，非亲历者不知也。今陶仲彝欲争入儒林，直是不知越缙也。若列入文苑，尚可为同光后劲；厕之儒林，黯然无色矣。^⑧

话中内容不仅与1909年他对李慈铭“于史学最长，掌故次之，诗文次之，经学又次之”^⑨的评价呼应，也解释了其后他在李慈铭日记交付石印出版之际追忆老辈零落时，仍持“先生自言经学不深，曩者王祭酒续刻经解，不敢以一卷舛厕其中，盖自诩则在史学、词章”^⑩的看法。再结合此前他上陈纂修体例时提出的“此次修史最要者审查所著之书，非确有学派师承者不得滥入‘儒林’”与“‘文苑’除国初诸大家外，其余以有著述卓然可传者为限，或诗家、或古文家、或骈文家、或金石学家、或校勘之学家、或文选学家，必须学有专长，方可列入此传”^⑪的意见，不难理解他为何力主将李慈铭置于文苑部分。^⑫

① 缪荃孙日记1894年十二月廿九日（1895年1月24日），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第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338页。

② 缪荃孙日记1911年七月十七日（9月9日），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第3册，第157页。

③ 于民初刊载于《古学汇刊》，见邓实、缪荃孙主编：《古学汇刊》，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第1337—1446页。

④ 《蔡元培函一》，（1912年3月24日），钱伯城、郭群一整理，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59页。

⑤ 蔡元培：《印行越缙堂日记缘起》，《越缙堂日记》，第2页。

⑥ 《缪荃孙函十九》，1915年5月25日—6月3日，陈东辉、程惠新：《缪荃孙致吴士鉴信札考释》，《文献》2017年第1期。

⑦ 谭宗浚：《希古堂集甲集》卷1《拟续修儒林文苑传条例》，《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6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9页。

⑧ 《吴士鉴函十四》（1915年6月3日），钱伯城、郭道一整理：《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第564页。

⑨ 许宝蘅日记1909年八月五日（9月18日），许宝蘅著，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60页。

⑩ 吴士鉴：《含嘉室杂稿·题李越缙先生日记摘钞后》，敖炼编：《吴士鉴著作集》第27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55页。

⑪ 《吴士鉴陈纂修体例》，朱师辙：《清史述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

⑫ 值得一提的是，其父吴庆坻曾评价李慈铭：“儒林文苑两称雄，海内心倾越缙翁”，参见吴庆坻：《寿李莼客先生六十》，《补松庐诗录》卷2，清宣统三年（1911）铅印本，第7页a。但出自祝寿诗，多有奉承意。

然而，在传统士人眼中，《儒林传》的地位远远高于《文苑传》，这也是身为李慈铭同乡、同年兼弟子的陶在铭（字仲彝）为李慈铭力争的重要原因。李慈铭嗣子李承侯亦为此奔走。其族兄李文紘在 1915 年《承侯弟为侍御公越缙叔列入清史儒林传晋都兼谋事赋此志别》一诗云：“长征万里值新秋，前路请纓志愿酬。执友纂修承汉魏（纂修清史繆小山、樊云门皆叔氏门弟子），先人列传续王刘”^①，透露了其行踪和目的。在路过上海时，李承侯专程拜访了繆荃孙，可惜二人所谈未能详知，惟后者在同日接到陶在铭的信后写下了自身感受：“毫无黑白，不值与辩论。”^②

事实上，在《越缙堂日记钞》刊行后，繆荃孙曾向李、陶二人求借日记。^③因未达成一致意见，导致繆荃孙继续节录刊行日记的愿望落空。此时得见李承侯为求人传匆匆抄来的日记数十段，他也不以为然。在致冒广生函中，繆荃孙写道：“李莼客列一传于‘文苑’，以陶子缜附之，似乎公道。其子力争要‘儒林’。问经学有著作否？钞来日记数十段，皆掇拾陈言，万不能谓之经学。莼客曾自言经学少功夫。只可不管。所上折子（全钞来），亦不如朱蓉生、屠梅君，‘文苑’尚不愧也。兄以为何如？”^④种种考量下，繆荃孙最终下定将李慈铭列入《文学传》的决心。数月后，他开始动手“撰吴敏树、李慈铭传”^⑤，并展开《文学传》的校订工作。

为符合《文学传》的定位，繆荃孙在李慈铭传前便言：“至都，即以诗词俚体名于时”，后续又强调李氏“俚体文气，盛言宜曷曷独造无一语落小家，数诗则选声鍊色，融洽古今，自成为一家之诗，当时罕有俦偶”。在同年五月十六日（6月28日）起撰的《文学传序》^⑥中回顾有清一代文学时，繆荃孙亦将其放入同光之际诗文大家的脉络中：

清代学人非宋明所几，至诗文卓然自立者，实不及宋明之盛。国初承几复社之余波，两开鸿博后，又云集四库七阁，远搜广储，鼓吹休明，止倡下和。嘉庆己未会榜比之鸿博，得人则朱珪、阮元典试之力也。诸人各有著撰，流传不朽，为有清极盛之时，后稍稍衰矣。同光之际，文推曾国藩，诗则北人推张之洞，南人推李慈铭为继起大家。今博考诸家之集而订其源流，录其尤者作文学传。

有意思的是，随即他话锋一转总结道：“至考据名家而经学无专书者，均隶于此，两传本无所轩轾云”。^⑦可以发现，这正是他此前与吴士鉴讨论时所说“不知两传有何轩轾”“别无专书”等语的翻版。如此操作不禁让人联想到光绪年间的人传风波：繆荃孙因拒绝纪大奎入《儒林传》而得罪掌院徐桐。^⑧或受此事影响，他不得不通过点出李慈铭之名，赞扬其为“继起大家”以及重申《儒学》《文学》二传实无高低的举动，作为对李承侯、陶在铭的回应和自我暗示。

在撰完李慈铭传后，繆荃孙的《文学传》再无新人加入。有意安排也好，偶然成之也罢^⑨，均在冥冥中坐实了李氏“旧文学殿军”^⑩的身份和其“初得户部门联云：余事祇修文苑传，闲身且署户曹郎”^⑪的傲气之言。至此，李慈铭的“经学家”特质因未有经史专著而被淡化，其文学贡献则被纳入“文苑”脉络中获得彰显。李慈铭的学术形象不再仅仅属于个体，而是成为繆荃孙笔下清学史图景中的一枚符号，其

① 李文紘：《承侯弟为侍御公越缙叔列入清史儒林传晋都兼谋事赋此志别》，《梦榭室诗存》卷上，1933年铅印本，第1页a。

② 繆荃孙日记1915年八月六日（9月14日），繆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繆荃孙全集·日记》第3册，第398页。

③ 繆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繆荃孙全集·日记》第3册，第205、206、212页。

④ 《繆荃孙函四》（1915年9月21日），上海博物馆图书馆编：《冒广生友朋书札》，第230页。

⑤ 繆荃孙日记1915年十月廿九日（12月5日），繆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繆荃孙全集·日记》第3册，第410页。

⑥ 繆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繆荃孙全集·日记》第3册，第386页。

⑦ 《繆荃孙文学传序》，《儒学传不分卷文学传不分卷》稿本，第280页。

⑧ 繆荃孙：《艺风堂文漫存》乙丁稿卷三《国史儒林文苑两传始末》，繆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繆荃孙全集·诗文1》，第662页。

⑨ 《文学传》从李慈铭传向前推，依次为吴汝纶附萧穆、周寿昌，谭莹附熊景星、黄子高、莹子宗浚，朱琦附吕馥、王拯，鲁一同附子贲，吴敏树附杨彝珍、张裕钊等。排列大致按照生年，但尚不严格。吴、萧列于李前，或许又与二人传的撰写早于李有关。《清史稿·文苑传》的排列和人数于此均有调整。

⑩ 蔡元培：《〈鲁迅全集〉序》，蔡元培著，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8卷（1935—1940），第525页。

⑪ 繆荃孙：《云自在龕随笔》，繆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繆荃孙全集·笔记》第1卷，第16页。

价值取决于能否嵌入特定的儒林或文苑谱系。

这种“规训”并非孤例。对比缪荃孙对俞樾的书写，可见后者凭借《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三部“确守家法，有功经籍”专书，得以在《儒林传》中稳居“汉学后劲”之位。^① 个案差异背后，折射出乾嘉学术范式在民初的权威延续——考据学的话语权仍由“专著范式”垄断，“体例未纯”的笔记体研究则被视为次等知识。在此过程中，以乾嘉汉学为学术依归的缪荃孙，凭借清史馆总纂职位行使学术编纂权力，将“专著范式”从考据学的方法论选择升格为知识合法性评判准绳，从而捍卫学术正统。^② 换言之，无论是对李慈铭的摈弃还是俞樾的收录，均是缪荃孙乾嘉汉学传承者身份和认同的鲜明反映。

数年后，桐城派大家马其昶另作《文苑传序》写道：“原自前史，以经学、理学属儒林，辞章属文苑，二者遂分轩輊，然实非也。经纬天地之谓文，文岂劣词乎。孔子论儒，有君子有小人，则儒不必皆贤，以其说世所习闻，故不易。要之，文章自有能事，其工者往往兼义理考据之胜。今特各从其所重者区之，然亦有记览该博而经学无专书者，虽不以诗文名，并次列于篇。”^③ 从中还可见经生、文士观念的缠绕以及为“文”正名之意。但当下《清史稿·文苑传序》已非缪、马二人原稿，其中言：“但取诗文有名能自成家者，汇为一编，以著有清一代文学之盛。派别异同，皆置勿论”^④，无疑已失去了前人寄予其中的微言大义。

（二）“此人有经学尚可存之”

在进入《清儒学案》前，李慈铭已被徐世昌收录于《晚晴簃诗汇》，列在卷173之首，文字介绍为：“李慈铭，原名模，字絜伯，一字莼客，晚号越缦，会稽人，光绪庚辰进士，历官山西道监察御史，有《白华绛树阁诗集》。”诗话则写道：

絜伯初官郎署，负盛名，晚始成进士，擢谏垣。生平博综群籍，尤精于史。今所传《越缦堂日记》累数十册，皆缀学论文语。已刻者《湖塘林馆骈体文》。及诗集自序谓所得意莫如诗，所致力莫如杜。又言以一身备人世之百艰。其所经者，由家及国，沧海之变故，固亦多矣。存其诗，足以征闾里之见闻，乡邦之文献，而国事朝局之是非，亦或有可考焉。^⑤

直接引用李慈铭自序的说法以表明其诗集的价值，可谓落入程序化的窠臼。总体来看，除“博综群籍，尤精于史”一句外，诗汇对李慈铭的评价并不高。这或许也影响了学案编纂诸人在初期对李慈铭的看法。^⑥

夏孙桐在写于1928年10月左右的《呈主府稿》一文中，除向徐世昌介绍《草目》的初步分工外，还有如下文字：

又前奉批指，李慈铭、王闿运、康有为、严复诸人。经同人斟酌，李维未有经史专著，其考订精博，实有心得，见于其读书杂识。惟列为正案，是否能称其实，应归入诸儒学案。王、康皆有专书，自成一种学说。严则译述西书，亦能开派，至其人之纯驳，又当别论。今取广义，故列其名。学案瑕瑜互见，毁誉兼存，将来应否成立，再请鉴裁。^⑦

大意是徐世昌此前询问编纂诸人李、王、康、严四人的具体位置及何以列名，夏孙桐于此答复同人讨论后

① 《俞樾传》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82《俞樾传》，第13298页。

② 缪荃孙在撰写《儒学传》时，整体也采取维护“旧学”的立场，对“新学”加以排斥与批判。参阅昱昊：《晚清民国清史〈儒林传〉研究》，第200—210页。

③ 马其昶：《抱润轩文集》卷5《清史文苑传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8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62页。

④ 《文苑传序》，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84《文苑传》，第13315页。金毓黻对此序有“盖以文论，文苑传序，最为拙劣，不知出何氏手笔”的批评，李诚怀疑此序为金梁所作，见李诚：《桐城派文人在清史馆》，《江淮文史》2008年第6期，第78页。

⑤ 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卷173，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343页。诗集自序即前揭《白华绛树阁诗初集自序》。

⑥ 诗汇编纂者与学案编纂班子有很大的重合。参见朱曦林：《从〈大清畿辅先哲传〉到〈清儒学案〉——徐世昌清学史著作编纂之演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编：《理论与史学》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72—173页。

⑦ 《清儒学案存稿》第1册稿本，无页码。

的意见。据文字可知，四人之名均列于最初的《草目》中。夏氏并认为李慈铭当从正案移至诸儒学案，理由即“未有经史专著”。不难发现，这样的理由与前述李慈铭落选《儒林传》的原因如出一辙。

李慈铭之所以能摆脱“滑入”诸儒学案之险，受惠于主观意见和客观现实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在曹秉章呈上王式通撰《越缙学案》初稿后，徐世昌随即阅目并有批语。^①而在王氏去世后四年，曹秉章重提此案云：“《李越缙案》，为书衡所辑。钩座于其所学，大加赞赏，事隔多年，恐亦不甚记忆。兹特检出，再呈钧鉴。”^②徐氏对此批注道：“请再细阅原来评语，此人有经学尚可存之”^③，可见他对李氏的看重。另一方面，1920年《越缙堂日记》成功影印出版^④，学案编纂同期购入越缙遗书的北平图书馆对李氏《汉书札记》《后汉书札记》《三国志札记》等书的整理和刊印^⑤，为世人进一步了解李慈铭的学术水平奠定了新的文献基础。

具体到内容中，虽参考并部分沿用了平步青和史稿的文字，但学案的叙述重心与前二者实有差别。因平传、史稿有模糊李慈铭的经、史水平的倾向或者说为了纠正传主“生前为词章之名所掩”^⑥，王式通在转引二者文字时，不仅将平传中“所致力者莫如史”一句进一步引申为“于史学致力最深”，并于前增加了原创的“说经确守乾嘉诸老家法”十字，完成改动后再附上史稿的文字。同时为暗中和切实弥补“未有经史著作”的缺陷，除在传前强调李慈铭“遗书渐出，学者服其翔实，翕然称之”外，王式通对撰著的介绍选择跳过寥寥数语的史稿而直接沿袭平氏小传，可谓是“别有用心”的叙述策略。^⑦

实际上，作为受汉学风余韵浸染之人，虽已认识到其中流弊，李慈铭仍被视为“坚守考证学的正统学派立场，矢志力学为汉学除弊雪污”。^⑧在平步青的文章中，我们尚难定位李慈铭的学术取向。缪荃孙将他置于文苑的叙述策略，很容易让人忽略其学人底色。而王式通不仅赋予和肯定了李慈铭经史大家的称号，还颇为清晰地勾勒了其汉宋兼采的形象。无论是传前谓“兼尊宋学，谓可以治心”，还是传中“专治汉学，仍服膺宋儒”以及所附致陈锦书、桂文灿书，均在体现李慈铭会通汉宋的一面。

王式通的这些操作，与学案发起人徐世昌的政治理想、学案全书论晚清汉宋关系的总体宗旨息息相关。作为清末民初政权更迭的关键人物及以“文治”著称的民国总统，徐世昌将“政统与道统合一”的政治理念深刻灌注于《清儒学案》之中。^⑨不难发现，他力图通过学案体系重构实现多重目标：将清代学术纳入黄宗羲（全祖望）的学案谱系，确立道统赓续的合法性；在新文化运动勃兴的背景中重树传统儒学权威；构建跨政权的文化和身份认同等。又正如研究者所说，徐世昌“对于中学，他沿着晚清以降‘会通汉宋以求新’的学术潮流，不存门户之见，汉宋兼采，主张‘殊途同归，咸主于有用’”。^⑩而从学案来看，“晚清汉学家对宋学态度，经历了一个‘治学宗汉，立身宗宋’到‘学通汉宋’的过程”。^⑪

在这样的编纂框架和理念预设下，李慈铭被策略性地塑造为汉宋兼采的典范。如此定位与同时期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李氏等人“旧辙已迷，新轸尚远，终于为一过渡之学者”^⑫的论断形成微妙呼应，也折射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认知范式：徐世昌主导的学案刻意凸显李慈铭调和汉宋的学术姿态，意在为其“道统重构”理想提供个案支撑；钱穆的学术批评则着眼于知识转型的断裂性，将李氏定位

① 有研究者提到国家图书馆藏有《清儒学案》稿本 318 册。（朱曦林：《近百年来〈清儒学案〉研究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 年第 3 期）笔者怀疑此中或有相关材料，但在国图网站上并未检索到此稿本信息，有待进一步考察。

② 《曹秉章来函》，1935 年正月廿七日（3 月 2 日），李立民：《〈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第 288 页。

③ 《徐世昌批语》，李立民：《〈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第 288 页。

④ 可参蔡元培：《印行越缙堂日记缘起》，《越缙堂日记》，第 1—4 页。

⑤ 因李慈铭“精研乙部，故先从诸史入手”，见《李慈铭汉书札记出版广告》，《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1929 年第 2 卷第 5 号。

⑥ 徐世昌著，沈芝盈、梁运华点校：《清儒学案》卷 185，第 4845 页。

⑦ 学案在李慈铭弟子一栏附陶方琦、陶澐宣、王继香三人，交游则附张之洞、王先谦、周寿昌、黄以周、谭献、朱一新等人，与史稿李慈铭传附陶方琦、谭献、李稷勋相比，无论是分类还是安排，似均更合理。

⑧ 李慈铭著，张桂丽校：《越缙堂读书记全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年，“前言”，第 2 页。

⑨⑩ 刘凤强：《〈清儒学案〉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年，第 14—15、207 页。

⑪ 朱曦林：《世变中的持守：徐世昌之学行与文化观考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

⑫ 陈兰甫条，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 703 页。

为传统学术范式崩解过程中的过渡载体。

相较于《清儒学案》小传对李慈铭汉学家身份的聚焦，王式通在《越缦堂读史札记序》中又展开了另一重谱系建构——将李氏史学渊源上溯至万斯同、全祖望的浙东学派脉络。他写道：“浙东自南宋后，久为文献渊藪。延致明季，其遗闻佚事，如唐鲁二王始末及节义之俦类，皆未笔诸书后，寢归湮没。赖有南雷季野、谢山诸老，以强博之才转相口授，得以流衍弗替。先生恭承其绪，志在裁制人伦，整齐物类，所蓄以应世用者深且远。”^①两种书写看似矛盾，实则共同编织成一张涵盖“经一史”双维度的收编网络，使李慈铭成为书写清学史时绕不开的人物之一。

不过，徐世昌一门对李慈铭的定位并未成为“盖棺论定”之言。王重民、张舜徽二人的评价，让人目光又回到了文苑与儒林之争上。^②在史稿、学案编纂同期出现的其他书籍，如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闵尔昌《碑传集补》和汪兆镛《碑传集三编》，虽设有儒林、文苑、经学、文学等栏目且均收录了李慈铭，但前书将他置于《官吏》一门^③，后二书则将其写入《科道》一栏。^④与此同时，李慈铭也未能得到新文化运动人物的青睐。^⑤反倒是民国掌故学者对他津津乐道，如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笔下的李慈铭诸条。可见，某人该入何传，具体形象如何，“主要还是取决于编纂者的价值取向、撰述体例及当时的学术氛围等复杂因素”。^⑥若对此种叙述差异不细加留意，现在的李慈铭形象，或许还是那“狂生”的标记。

结语

李慈铭曾因黄宗羲缺少代表性的经学著作，将其删出自撰的《国朝儒林经籍小志》^⑦，不料自己身后亦面临同样遭遇。历史的巧合令人唏嘘时又在冥冥中印证了那句“乌乎，儒林耶？文苑耶？听后世之我同；独行耶？隐逸耶？止足耶？是三者吾能信之于我躬”。^⑧随着儒林、文苑、学案等体例在近代学术史书写中的式微，关于李慈铭入何传、是否入传的争议已经被大多数人遗忘。但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始终存在：当我们在各种文本中阅读李慈铭时，究竟在阅读谁？是那位活在19世纪的绍兴人，还是20世纪抑或当下书写他的后来人？

由于《清史稿》《清儒学案》具体编纂语境的不同，呈现出对传主李慈铭的差异化书写：一以维护官方学术正统为旨归，在叙述时进行了侧重于文的处理；一则寄托“政统与道统合一”的深层诉求，着力塑造李慈铭在清学谱系中“汉宋兼采”的面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参与《清史稿》纂修的缪荃孙、吴

① 王式通：《越缦堂读史札记序》，李慈铭撰，王重民辑：《越缦堂读史札记》，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1932年，第1页b—2页a。《越缦堂文集跋》中则有“近代越中巨子如西河考据，石笥词章，实斋文史，躬耻义理，流衍儒林，并光典录。先生晚出，学有异同，沈思藻翰，复极虑表，余艺具存，前贤生畏”等语。

② 王重民：《李越缦先生著述考》，《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2年第6卷第5号，第1页；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20《越缦堂文集十二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06页；《清人笔记条辨》卷9《越缦堂日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8页。同时可参见戴海斌：《读〈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札记之三——李慈铭究竟“儒林邪，文苑邪？”》，《上海书评》2021年11月24日。

③ 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李慈铭条》，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辑第78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179页。

④ 闵尔昌：《碑传集补》卷10《科道》，《清朝碑传全集》第4册，台北：大化书局，1984年，第3024页；汪兆镛：《碑传集三编》卷11《科道》，《清朝碑传全集》第5册，台北：大化书局，1984年，第3902页。

⑤ 不过胡适、鲁迅对李慈铭日记多有关注。前者虽然认为李氏日记并非“正宗嫡派”，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不妨模仿着试试”。（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鲁迅全集》，北京：同心出版社，2014年，第165页）后者则言：“看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第三册。这部书也是使我重提起做日记的重要原因”。（胡适日记1921年4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4页）作为新史学开创者的梁启超在20年代初总结清儒整理旧学之成绩时，也曾利用李慈铭日记论证《论语正义》一书的实际作者。[梁启超著，夏晓虹，陆胤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41页]

⑥ 陆思麟：《清人传记中的章氏学术记载：〈清史稿·文苑传〉章学诚传考论》，《古典文献研究》2015年第2期。

⑦ 张桂丽：《李慈铭的清学史观——以〈国朝儒林经籍小志〉为中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第2期。

⑧ 李慈铭：《六十一岁小像自赞》，李慈铭撰，王重民辑：《越缦堂文集》卷11，第5页b—6页a。

士鉴、金梁，还是编纂《清儒学案》的徐世昌、夏孙桐、王式通，均是成长、成熟于同光之际又延续到民国修史的遗民。李慈铭之于他们并非遥远的前辈学者而是切身交往过的友人。这种特殊身份使他们在书写李慈铭时，既包含着对同光时期学术传统的追忆，也隐含着对清朝灭亡后文化和身份认同的思考，以及对当下学术、政治现状的省思。在此意义上，《清史稿》《清儒学案》对李慈铭的书写，是借叙述“故国学术”之名，行“遗民政治”之实。

进言之，在清末民初政权鼎革和知识话语转型的特殊背景下，李慈铭形象在“同光后劲”“汉宋兼采”“浙东余绪”“过渡学者”等标签间的游移，实为不同历史主体通过书写争夺学术话语权的结果。叙述的差异绝非偶然，而是话语权争夺在文本中的具象化。李慈铭学术形象的不确定性，同时暴露出清学史书写中“回溯性建构”的普遍困境：所谓“汉学正统”“科学精神”等说法，经常存在想象性与目的性的成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学术史的书写也从来不是静止的过往，而是当下意识形态争夺的战场。因此，唯有解剖这些“记忆之场”，方能撕开宏大叙事的裂隙，揭示更多被压抑的复调历史。

(责任编辑：周奇)

Identity Recognition and Narrative Politics of Qing Academic History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Era

—— Take the Biography of Li Ciming as Center

WANG Siyu

Abstract: Li Ciming often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early 1930s, Wang Shitong wrote a short biography of Li Ciming in *Qingru Xuean* (《清儒学案·越縵学案》), synthesizing Ping Buqing's biography of Li (Licimingzhuan in *Qingshigao*, 《清史稿·李慈铭传》) and the postscript content from Wang Chongmin's compilation of the *Yuemantang Anthology* (《越縵堂文集》). Without specialized writings, figures such as Miao Quansun, Wu Shijian, Xu Shichang, and Xia Sun tong made different choices regarding whether Li Ciming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Rulinzhuan* (《儒林传》) or *Wenyuanzhuan* (《文苑传》), and whether he should be categorized under the Zheng'an ("正案") or Zhuru ("诸儒") after careful deliberation. Their writing modes shaped key texts of how Li Ciming was perceived by later generation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text production not only mirror the compilers' identity orientations but also underscore the narrative-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inherent in early Republican Qing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 Li Ciming,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identity recognition, narrative politics